

研究論文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 影響因素研究

曾麗紅

## 摘要

本文集中探討中國情境下的政治/技術關係命題：在轉型社會語境下，一種新的資訊技術何以進入到政治傳播的結構與流通管道？是哪些因素在背後推動它？又是哪些因素在背後制約了它？鑒此，本文針對廣東省121個區縣級政府政務微信的創新擴散情況進行了實證考察(N=121)。研究發現：上級政府壓力、府際競爭、府際學習等常規壓力指標仍然是影響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主導因素；另一方面，公眾壓力指標中的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對政務微信的創新擴散也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本研究開拓了創新擴散理論在政治傳播領域的本土化發展，亦豐富了政策擴散理論在基層政府資訊技術採納過程中的經驗意涵。

關鍵詞：轉型中國、政務微信、創新擴散

曾麗紅，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系副教授。研究興趣：新媒體研究、政治傳播。電郵：ZLH0406@qq.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7年2月22日。論文接受日期：2018年5月3日。

---

Research Article

##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Official WeChat Use at Grassroots Government Agencies in a Transforming Society

Lihong ZENG

---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a transforming China by explor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urvey on the use of government WeChat in 121 district and county agencies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N = 121). The study found that pressure from hig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and intergovernmental learning were the primary factors affecting the use of government WeChat. Conversely, the number of public crise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WeChat. These findings helped identify specific factors of WeChat diffusion by government agencies. They also provide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diffusion within grassroots government agencies.

**Keywords:** transforming China, government WeChat,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eng, L. (2018).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official WeChat use at grassroots government agencies in a transforming society.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6, 89–120.

---

Lihong Z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research,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Official WeChat Use*

## 致謝

本研究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專案「轉型社會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與機制研究——基於廣東區縣級政府的實證考察」(計劃編號：GD16XXW02)以及廣州大學優秀「青年博士」專案計劃「政務新媒體的傳播策略研究」(計劃編號為：YB201706)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議。

## 引言

當下越來越多的黨政機構在微信上開通公眾帳號，將其作為政府資訊發布管道、行政辦事線上服務平台和政民互動交流空間。政務微信成為繼政府網站、政務微博之後中國各級政府採納的又一項資訊技術創新，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儘管政務微信的傳播功效得到了多方實證，但是在具體實踐情境中不同的政府部門對待其態度卻截然不同：熱情擁抱者有之，裹足不前者有之，冷淡漠然者亦有之。在這種實踐悖論的背後，我們不禁要追問：資訊技術在政府內部的創新擴散究竟遵循著什麼樣的邏輯和規律？政務微信的創新擴散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本研究選擇了政務微信在轉型中國基層政府創新擴散的這樣一個觀測維度，希冀以此來管窺和透視轉型中國的駁雜政治生態與多重行動結構。

政府資訊技術的創新擴散是指某項資訊技術經過一段時間後在政府組織之間傳播的過程，主要表現為尚未使用某項資訊技術的政府部門不斷使用並擴大其覆蓋範圍的過程。同一般創新的擴散一樣，政府資訊技術創新的擴散是指某項已經被特定政府部門應用的資訊技術在其他尚未使用的政府部門中傳播的過程。相關概念電子政務則是指資訊技術在政府部門中的應用，政府網站、政務微博和政務微信等資訊系統都是電子政務的主要構件，具體來說，政府網站代表了第一代資訊技術 (Web1.0) 在政府部門中的應用，而政務微博和政務微信則代表交互性更強的第二代資訊技術 (Web2.0) 在政府部門中的應用。

一種新的資訊技術如何進入到中國政治傳播的機會結構和流通管道？目前學界圍繞在電子政務的相關領域開展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實證研究。Wu與Bauer (2010) 研究發現，政府經濟發展水準、科技財政支出、居民教育水準以及城市化率等與電子政務的發展水準顯著正相關。馬亮 (2012a) 研究顯示，政府資源和能力、區域環境特徵和公眾需求與電子政務的發展水準顯著正相關，同級政府間的競爭和學習也同樣對其產生顯著正向影響。馬亮 (2013a) 研究發現，府際競爭、府際學習、上級政府壓力、政府資源與能力等因素與政府網站發展水準顯著正相關。馬亮 (2013b) 研究則揭示，影響地方政府政務微博擴散的主要因素是同級政府競爭與政府資源與能力。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以上研究為本文的發展提供了清晰的邏輯指引和理論論證，然鑒於研究對象、層次和情境的差異，此領域仍有情境拓延和理論挖潛的空間：首先，既往研究對象較多地聚焦在政府網站和政務微博方面，政務微信的研究較少涉及。資訊技術的功能、屬性、特徵不同，其創新擴散的路徑或有差異。其次，既有研究層次大多聚焦於省市級層面，帶有頂層意識和精英導向。在中國五級政府的「壓力型體制」下，基層政府或有一套不同的操作理念和實踐邏輯。再次，既有研究抽離了當下中國的轉型社會情境。伴隨著抗爭政治時代的來臨，新的資訊技術成為了社會管理的重要手段。作為「主動的地方政治」，政府回應社會的方式正在不斷轉型。誠如Graham等(2013)指出：當下最有發展前途的研究不再是追問擴散是否發生或涉及到哪些主體，而是去深入探索創新擴散的情境特質(conditional nature)。前人研究的諸多缺失，恰好給本文提供了創新的依據和突破的契機。

## 文獻綜述

### 政策擴散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和「重塑政府」浪潮席捲全球以來，人們對政府與創新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Osborne & Gaebler, 1992)。創新不再被政府視為洪水猛獸，政府被要求像企業一樣運轉，並被認為完全可以接受採納創新(Borins, 2008)。在這種理念指引下，一些政府創新和採納了大量新的資訊技術，極大地提高了政府行政績效並獲得了公眾的信任和 support；而另一些政府則對創新的態度處之漠然，完全不為所動。為什麼不同政府在面對資訊技術的創新擴散時會表現出如此不同的態度？相關研究主要受到政策擴散研究視角的指導，該視角重點關注政治體制及相關政治變數，譬如在考察政府自身及其轄區特徵的同時，還特別注重考察府際關係對政策擴散的影響。

政策擴散研究範式最早可追溯到學者Berry & Berry(1999)提出的一個四維壓力模型，該模型檢驗政策的擴散主要受到社會學習、經濟競爭、政治規範與公民壓力等因素的驅動。循此理論脈絡，West(200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進一步拓展檢驗，發現電子政務的發展還受到轄區特徵、組織屬性、財政資源和政治特徵等因素的綜合影響。繼此之後，Tolbert等(2008)發現，政府行政能力、改革和改良的意願、政府財富資源和公眾的受教育程度都正向影響了政府的創新採納行為。Lee等(2011)針對全球電子政務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與他國間的競爭、對外交流學習、政治規範和公眾壓力對電子政務的發展皆具有顯著影響。Jun & Weare (2011)研究則指出，應對公共需求和謀取合法性是推動電子政務創新的主要因素。

### 創新擴散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

創新擴散是傳播學的重要理論模式之一。擴散是創新通過一定時間，經由特定的管道在某一社會團體的成員中傳播的過程(羅傑斯，2002：5)。羅傑斯總結了創新採納的五種變數：新事物本身的屬性，採納的決策方式、傳播管道、社會制度，以及變革推動者的推廣力度。他指出，一個社會系統是一組相互聯繫的單位，他們面臨共同問題，有著共同的目標。由於社會系統中各個單位的行為方式並不完全一樣，因此產生了結構。這種結構使系統中個體行為具有規律性、穩定性，它使人能夠以一定的準確度預測行為(羅傑斯，2002：21)。羅傑斯後來曾小幅修正他的理論：第一，批評主流範式沒有注意到結構的制約；第二，提出以匯合模式取代線性擴散模式；第三，增添新議題的擴散過程(李金銓，2014)。近年來，創新擴散研究一個很重要的進展是探索組織中的創新過程。該研究取向認為，創新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而是一套組成元素和關係(常昌富，2000：293-298)。對政府組織而言，一項資訊技術的創新擴散同樣面臨新事物本身的屬性，採納的決策方式(如政治結構、社會壓力、組織干預)以及社會制度(如技術基礎設施、媒體和經濟環境)等元素和關係的組合影響。

在中國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學者祝建華、何舟(2002)發現，在經濟發展程度、媒體環境、社會制度等條件各不相同的情況下，互聯網擴散過程異中有同，相同點多於相異點。張明新、韋路(2006)提出，農村居民的人口變數、行為變數(大眾媒介使用、人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際交往、創新傳播科技採納)和心理變數(對移動電話技術特徵的主觀認知、對移動電話流程度主觀認知、對移動電話需求的主觀認知)可顯著預測移動電話在中國農村地區的擴散和使用。段京肅、王錫苓、李惠民(2007)調研發現,社會和市場的阻力、資訊系統的缺失和保障體系的滯後以及來自媒介內容和媒介技術特徵的阻力共同制約了西部農村互聯網的擴散和發展。郝曉鳴、趙靳秋(2007)指出,農村互聯網的推廣和使用除了受到個人因素的影響之外,還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約。

### 轉型中國的政治社會情境

一直以來,許多經典的創新擴散研究均聚焦於民主聯邦的政體結構(Bulmer, Dolowitz, Humphreys, & Padgett, 2007)。然而新近的非聯邦政體結構的國家例如轉型中國的研究,也得到了高度重視(Yang, 2006)。系列研究證實,中國地方政府在經濟政策和公共服務上的實驗和擴散導致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政黨適應性(Heilmann & Perry, 2011)。儘管理論上認為集權不可能有利於地方政府的創新行為(Rose, 1980),但公共商品的創新卻有利於其他地方政府搭便車,因此集權制度結構有利於數量較大的地方政府的創新(Strumpf, 2002)。事實上,集權國家中央或上級政府的垂直干預比民主分權國家更加複雜,地方政府採納一個全國性的政策可能並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刺激,而是為了表達對中央威權的忠誠(Montinola, Qian, & Weingast, 1996)。

轉型中國的政體結構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個特徵是中央-地方關係,垂直行政集權和財政分權共存。地方政府有責任承擔大多數的國家社會福利開支(Chou, 2008),在公共事務管理上,地方政府必須服從中央和上級政府的指令和政策,但也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Foster, 2006)。第二個特徵是地方政府官員的人事調動和升遷制度。地方官員是上級領導人任命或選擇的,不是選民直接投票選出來的(Montinola, Qian, & Weingast, 1996)。因此,地方官員更多地關注和依賴由上級政府設計的識別和評估其工作表現的評價系統,這樣一種人事晉升制度可能導致地方政府決策更加關注上級政府而不是公眾(Kung & Chen,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2011)。由於地方政府具有發展地方財政收入的相對自主性，政府有明顯的動機去採納創新的政策和措施來發展經濟、增加財政收入和節省財政開支。

轉型中國的政治社會情境是與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等關鍵詞聯繫在一起的，關注社會運動的研究者長期持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對社會運動浪潮的理論解析，必須和一個社會變遷的理論聯繫對接起來 (Eyerman & Andrew, 1991)。因為正是社會變遷本身，為社會運動的肇端提供了種種結構性的條件。中國社會的偉大轉型，首先是從「總體性社會」向「後總體性社會」的轉變，具體表現為市場經濟時代市場對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取代了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稀缺資源的壟斷性配置，從而導致了「自由活動空間」和「自由流動資源」的誕生，為公民行動的發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孫立平、晉軍、何江穗、畢向陽，1999：76-78)。中國社會自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後，其社會結構轉型逐漸走向了「斷裂」的發展方向，「斷裂」的現象不但出現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而且出現在就業者 and 失業者以及中產階層和底層弱勢群體之間 (孫立平，200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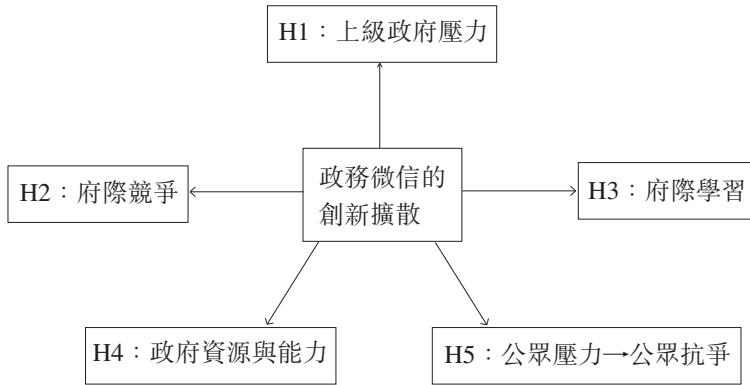
由於進入了「後總體性社會」，轉型中國面臨著種種結構性的政治風險和挑戰。「從政治上來看：在國家和公民關係上，政治忠誠被法律制度的調控和萌芽中的公民意識所取代；個人意願的表達，在網路時代成為一種個人風格；由於地方政府成為具有自身利益的行動主體，導致各級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持續受到各種事實性證據的考驗」(劉能，2008)。總之，「在哪裡現代化風險被『承認』……有集體的對風險的知識和信仰，以及對原因和結果的關聯鏈的政治闡述——在哪裡風險就會發展出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政治動力……它開啟了原來封閉的行動區域和機會」(烏爾里希·貝克，2003：93)。故此有學者認為，「抗爭性政治」已然成為當代中國政治社會學的基本問題 (于建嶸，2010：38)。



## 政府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理論模型的推導和建構

綜上，影響政府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的因素無外乎內外方面的關係和元素。內部主要是指政府轄區屬性及政府特徵，外部主要是指全國性和區域性的擴散因素。只有將兩方面結合考慮，才能避免單一因素解釋導致偏誤結論。鑒於轉型中國的抗爭性政治等情境特點，本文在參照政策擴散和創新擴散研究範式的理論基礎上，搭建了一個契合轉型中國政治社會情境的理論模型，藉此解釋轉型中國基層政府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的關鍵因素（如圖一所示）。

圖一 研究的理論框架



本文提出的研究模型兼顧了政策擴散和創新擴散研究範式中的結構視角和關係維度。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可分為五個維度，包括：上級政府壓力、府際競爭、府際學習、公眾壓力以及政府資源與能力。本文的理論框架與Berry & Berry (1999)的理論模型具有較強的相關性。Berry & Berry (1999)提出將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劃分為內部決定因素和外部擴散效應。前者包括決定創新動機、資源和障礙的一系列因素，後者則由來自上級和同級的擴散效應構成。他們認為：來自上級政府壓力、府際關係和轄區公眾的壓力是推動政府創新擴散的主要因素，只要壓力達到一定程度，壓力就會自動轉化為動力，從而推動政府主動採用創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在中國基層運作過程中，儘管許多政府在上級政府壓力、府際關係和公眾壓力的多重作用下期望通過創新謀求突破，但由於財政資源、人力資本、技術設備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能力欠缺而無法付諸實踐，可謂「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將政府資源與能力納入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模型，將有效拓展既有模型的理論視域並提高其現實解釋力。此外，研究框架兼顧到轉型中國「抗爭性政治」導致的群體性抗爭事件激增的社會情境特質，故而在公眾壓力指標下另發展出一條公眾抗爭的研究假設。總之，在考察轉型中國基層政府資訊技術的創新擴散現象時，既要從其被動的壓力角度分析，也要從其主動的能力角度考察，只有通過對內部動力和外部壓力的綜合考量，才能提供更為系統深入的解釋。

## 研究假設的提出

在推導出科學系統和邏輯周延的理論模型之後，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 上級政府壓力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影響可以歸結為強制性壓力的影響。研究發現，中央政府的激勵會對地方政府採納某項政策創新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Daley & Garand, 2005)。當下「壓力型體制」和「政治錦標賽」的特徵在轉型中國的基層政府非常突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級政府不得不「眼睛向上」，因為上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下級政府及其官員的資源分配與任務安排，所以在中國政府部門中，「上行下效」的色彩非常普遍和濃厚(李侃如，2010：68)。當上級政府開通政務微信後，下級政府「亦步亦趨」的可能性會很大。

一方面，積極回應上級政府的政策與要求是承認上級權威的必備要義；另一方面，上級政府在開通政務微信後，一般都會要求下級政府提供鏈結位址和資訊服務，這樣一來也會促使下級政府為了迎合上級要求而隨之開通。研究者從訪談中也得知，「政務微信的開通，上級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的行政命令是最重要的。從政務公開的角度來說，政務微信也是一條管道，一個途徑。首先趨勢肯定是要做的，但是限時限刻立馬啟動上級肯定有這個要求，我們不一定是在非常成熟或者準備很充分的情況下來做的，因為上面要求你什麼時候建你就必須建」。<sup>1</sup>因而，「上級部門的要求和倒逼，是政務微信開通的重要助推力之一。由於業務上的關聯性，政務微信的很多功能也需要跨層級、上下聯動才能實現」。<sup>2</sup>

於是，綜上理論指引和經驗導向，本文提出如下理論假設：

**H1：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與上級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正相關。**

### 府際競爭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通常會採納某些創新來獲得競爭優勢、降低學習成本或滿足合法性需求。從理論上來說，基層政府往往會將與其處於同級地位政府視為競爭對手。但是密切監測所有同級政府並將它們都作為競爭對手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經濟的，因為競爭對手數量較多，況且它們在規模、定位和發展階段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在實際情況中，基層政府通常選取地理位置比較靠近、發展規模比較類似和發展階段比較相近政府作為自己的競爭對手，並且對其政策動向和創新趨勢進行密切監測，跟進和效仿。西方語境下，所有的政策擴散都假定各州之間的「競爭性效法」，為了服從全國或地區的既有標準，或者僅僅是為了規避劣勢、佔領優勢，各州之間相互開展競爭 (Berry & Berry, 1999)。既然基層政府習慣於將鄰近政府視為自己的競爭對手，那麼本級政府採納開通政務微信的數量極有可能受到鄰近區域的影響。因此，當鄰近政府開通政務微信的數量較多時，本級政府開通的數量也會相應地增長。於是，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與同一行政轄區內鄰近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正相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 府際學習

最早開展的政策擴散研究受到了創新擴散理論的啟示，即同級政府之間的模仿，特別是地理接壤的政府之間的相互學習(Berry & Berry, 1990)。「擴散的本質是資訊的溝通，社會網路對這種擴散機制的解釋是最為有力的，因為佔據重要網路節點的主體更容易獲取創新資訊並做出採納決策」(Ibarra, 1993)。當各州借鑒其他州創新的成功實踐時，它們其實是在互相學習——尋求政策創新的捷徑，以降低搜索成本。因為學習不僅可以降低成本和風險還可以提高創新的成功概率，所以推動政府創新的重要因素是政府之間的學習(Nicholson-Crotty, 2008)。研究顯示，政府時常會通過私人關係網路、新聞媒體、專業培訓、專業協會等多種管道得知類似的同行創新行為的開展。政府間專業協會作為政府官員的職業交流網路，在政府間學習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Balla, 2001)。

在實地調研過程中，某區網路宣傳科的政府官員告訴筆者，「當前我們政府部門有兩大中心工作：一個是維穩，一個是招商。我們區曾經爆發過不少的輿情事件，比如土地糾紛事件、討薪事件和各個幫派之爭等，讓我們一直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但是，近年來由於我們建構了比較成熟的資訊管理機制和學習交流機制，所以大部分輿情事件都被成功化解了。我們的政府組織學習能力很強，一直在實踐中磨礪，在實踐中不斷學習和成長」。<sup>3</sup> 綜上可見，府際學習對政府資訊技術的創新擴散至關重要。相應的，如果基層政府的學習資源越多，那麼其效仿並採納其他政府創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理論假設：

**H3：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與學習資源的多少正相關。**

## 政府資源與能力

財政資源作為創新的有利條件對政府創新非常重要。一些創新專案需要大筆的政府開支，因此政府的資源與能力至關重要。不但經濟資源在推動政策擴散時通常是重要的，而且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態對於公共服務的創新也會產生重要影響(Gray, 1974)。政務微信是一種新的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資訊技術應用，也可以從組織創新角度進行考察。既然創新對於採納者而言意味著採用一種新的理念、新的實踐和方法，那麼組織創新則是指組織採納了相對而言的新的事物。一般來說，組織資源越多，組織創新的條件越優越，那麼組織採用創新的傾向就越強，因為組織創新的基礎條件一般為冗餘資源，而資源冗餘與組織創新之間存在著正向關係。綜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4a：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與財政資源的多少正相關。**

在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結果發布會暨電子政務高峰論壇上，政府網站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正式納入了政務微信的開通和使用情況，政務微信成為繼「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政府網站」之後的第三條政務公開途徑。由此可見，政務微信昭示著電子政務未來發展的新方向。電子政務是一項政府組織內的資訊技術創新應用，因此對政府部門財力、人力和技術資源等基礎設施的投入較高 (Tolbert, Mossberger, & McNeal, 2008)。當下電子政務的發展保障了政務微信技術平台應用，因此，政務微信對政府技術基礎設施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有鑒於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論假設：

**H4b：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與電子政務發展水準的高低正相關。**

### 公眾壓力

政府組織是否採用某項創新可能受到公民或服務對象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因為採納某項創新主要是為了滿足特定的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從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這一角度來看，轄區內所辦企業和轄區公民的需求非常重要 (Ahn, 2011)。政府為了滿足企業和公民的需求，傾向於採取完善配套公共服務設施以及改善投資環境的辦法，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意識來作為具體的施政改良措施。因此，基層政府受到來自轄區公民的治理壓力，他們要求政府採納其他地區所創設的新政策和新服務。在政府創新的過程中，新聞媒體通過公開報導其他地區政府成功創設的創新專案，也可為鼓動公眾壓力發揮重要作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政務微信的永久開通用戶主要為轄區居民，尤其是轄區內的永久居民，因此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受到轄區居民使用移動互聯網路情況的影響。一般而言，當轄區居民中的線民比例較高時，政府通過電子政務的形式來滿足用戶需求的意願和壓力也就更強，因為政府提供電子政務的規模效應和網路效應會凸顯出來。同時，如果轄區的線民通過互聯網參政議政的活躍程度越高，那麼政府提供並提高配套電子政務的興趣就越能得到激發(Tolbert, Mossberger, & McNeal, 2008)。否則，如果轄區線民數量少，電子政務的利用效率低，那麼政府發展電子政務就會缺乏足夠的興趣與動力。鑒於政務微信資訊技術的應用高度依賴於移動互聯網路的基礎設施和物理平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5a：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與轄區居民移動電話用戶總數的多少正相關。**

毋庸諱言，「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動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媒介，而媒介化程度——已然成為判斷社會抗爭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周裕瓊、楊雲康，2017)。媒介化程度較高的政府在「外壓型體制下」更傾向於開通政務微信以服務於民。此外，在技術和關係賦權的移動互聯網時代，「資訊和通訊技術通過降低成本、提升集體認同和創造新機會可以促進社會動員。同時，資訊與通訊技術也加快並擴展了抗爭的傳播，豐富了抗爭劇碼，促進了分權的、非等級的組織形式的運用」(楊國斌，2013：14)。媒介化程度較高區域內的公民善於利用新媒體技術平台的話語訴求進行資源動員，爭取政治機會，並形成一定格局的「抗爭性政治」。當下，抗爭性政治在沿海發達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據不完全統計，十年來中國發生的重大網路事件中廣東就有15起(媒介化程度較高)，佔全國總比的8.2%，僅次於首都北京(鐘智錦、曾繁旭，2014)。

在訪談過程中，基層政府官員告訴研究者，「我們開通政務微信，一方面是為了便民，百姓可自行繳納水電煤氣和生活費等，同時也提高了政府的辦事效率。另一方面主要是為了增加百姓和政府之間的聯繫和溝通，化解百姓心中積存的一些戾氣和怨氣。有時候，微信是一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個很好的傳遞資訊和傳達情緒的視窗。通過這個視窗，我們可以掌握到一些基本面上的情況和大致動向」。<sup>4</sup>在調研不斷深入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維穩」成為了當下基層政府官員頭腦裡最緊繃的那根弦，因為它關係到每位官員的政治仕途和身家性命。故此，基層政府的許多創新應用本質上都受到「維穩」邏輯的鉗制和影響，因為「屁股決定腦袋」。

針對轉型中國的政治社會情境，本文開創性地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5b：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與轄區居民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的多少正相關。**

## 數據採集與變數選取

### 數據採集

#### I. 選擇樣本

##### 1. 選擇考察樣本

本文的實證考察樣本是廣東省基層區縣級政府，主要基於以下兩個理由：第一，廣東省作為中國的互聯網超級大省，其互聯網發展的各项指標在全國一直名列前茅，而政務微信的發展更是搶佔先機，其經年積累的電子政務實踐足以支撐其作為一個觀測中國政府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的自然實驗室。第二，廣東地處東南沿海，毗鄰港澳地區，是新思想和新觀念的策源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發展和利益格局的調整，一方面社會階層矛盾漸次浮現，另一方面公民維權意識日趨濃厚，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語境孕育了廣東較為活躍的公民意識與抗爭資源。如近年來頻頻引爆全國輿論的烏坎事件、番禺垃圾焚燒事件、茂名PX事件和鶴山反核事件等，均凸顯出廣東豐富的社會環境和人文生態，同時亦折射出各種權力和行動的交光互影。

##### 2. 選擇分析單位

本文選取區縣級作為基層政府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的分析單位，主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要基於以下三個理由：第一，既往研究主要集中於省、地市級行政層面，缺少對地市級以下基層行政層級的考量和關照。第二，本文還需要綜合考慮到引數和因變數相關指標資料獲取的有效性、可行性和難易程度。故此，本研究排除了區縣級以下行政層面的分析單位(如鄉、鎮、街道辦等，因其數據指標難以獲取)，最終選取了區縣級政府(包括區、縣和縣級市政府)作為分析單位。第三，將樣本擴大到基層區縣級政府，能夠為本研究提供更多的觀測值，克服樣本量過小的問題，從而提高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 3. 選擇時間維度

本研究選取截止2015年10月15日這個時間節點前所搜索到的數據資料來進行統計分析。選取這個時間點，除了數據資料的可獲得性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2013年是政務微信元年，自2013年10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政府資訊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後，越來越多的政府機關開始試水政務微信。截至2015年10月15日，廣東省政務微信的規模發展已經經歷了兩年的時間，兩年的時間長度積累足以達到一定的觀測目的和研究效度。

## II. 資料獲取

本項研究的數據資料均來自於公開的二手統計資料和研究者本人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可以確保資料來源的可靠性和研究結論的可重複性。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表一 變數名稱定義及操作化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假設	變數的操作化
<b>因變數</b>			
政務微信的創新擴散 (政務微信開通數量)	區縣級政府黨政機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	/	手動搜索
<b>引數</b>			
上級政府壓力	地市級政府黨政機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	+	手動搜索
府際競爭	同一地市轄區內區縣級政府黨政機關政務微信開通數量的均值	+	手動搜索
府際學習	鄰近區縣級政府政務新媒體學習交流和本級區縣級政府政務新媒體培訓交流活動的數量	+	廣東省區縣級政府網站
政府財政健康狀況	區縣級政府財政收支之差佔財政支出的比重	+	廣東省地級市統計年鑒
電子政務發展水準	進入中國區縣級政府網站績效評估排名前100名的為1，未進入的為0	+	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資料
移動電話用戶總數*	區縣級政府年末移動電話用戶總數	+	廣東省地級市統計年鑒
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	區縣級政府群體性抗爭事件的數量	+	中國慧科新聞資料庫
<b>控制變數</b>			
轄區經濟發展水準*	區縣級政府人均GDP(元/人)	?	廣東省地級市統計年鑒
轄區人口規模*	區縣級政府年末人口總數(萬人)	?	廣東省地級市統計年鑒

註：\*表示對該變數選取自然對數進行統計分析。在假設方向中，+、-、?、/分別表示引數與因變數呈正相關、負相關、未知或不適用的關係

## 變數選取與測量

### I. 因變數

早期政策擴散的研究大多局限於某項單一的政策或管理領域，並且一般是從是否採納某項創新的二分法來進行簡單測量，此後更多研究開始採用更加複雜和周密的測量方法，比如同時考察多項指標設計或採用反映創新程度的複雜量表。由於中國的政務微信發展還處於初期階段，對其進行程式複雜的指標建構和量表分析可能難以獲得比較理想的結果。故此，本文參照了馬亮(2013b)對政務微博擴散研究的設計，採用廣東省區縣級政府黨政機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作為因變數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測量指標。由於此項數據獲取難度大，導致本研究無法再兼顧到基層政府開通微信的不同類型和影響力權重，事實上儘管有些政府開通的微信數量少但其覆蓋的功能多、影響大，卻可能因為沒有分開開設從而在因變數指標顯示度上得分較低。

## II. 自變量

### 1. 上級政府壓力

通常來說，基層政府是將其「頂頭上司」視為必須要服從的上級權力機構，這是由於恰恰是基層政府的直接上級決定了下級政府的資源分配和任務安排。鑒於中國政府場域的實踐運作邏輯，本文採用地市級政府黨政機關開通政務微信的數量，作為考察指標來衡量基層區縣級政府面臨的上級政府壓力，儘管這個概念的測量不一定特別精準，但這是本文能夠獲取到的最貼近的可操作化數據。

### 2. 府際競爭

目前支配中國地方政府的主要管理邏輯是「行政區管理」和「行政區經濟」(王健、鮑靜、劉小康、王鈿利，2004)，一方面，地方政府通常以鄰為壑，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另一方面，以目標責任考核為人事升遷導向的「壓力型體制」更深地加劇了地方政府之間這種橫向的惡性競爭(榮敬本，2009)。在跨地區流動比較困難的情況下，為了爭奪有限的區域發展條件，同一行政轄區內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展開激烈的競爭。從這個角度來看，地方政府更偏向選取那些屬於同一上級行政轄區內的兄弟政府作為自己的競爭對手或學習榜樣(Li & Zhou, 2005)。故此，本文選用同一地市轄區內所有區縣級政府黨政機關開通的政務微信數量的均值來作為衡量區縣級政府的府際競爭程度指標。

### 3. 府際學習

如何選用一個合適的指標來衡量政府之間的學習程度，是一個極其困難的方法論問題，學者們曾經對此進行了多維度的探討和研究。Walker等(1969)採用的是問卷調查的方法，揭示政府官員的主觀認知，即探尋政府官員向其他政府學習的程度(馬亮，2011)。Lee等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2011)採用的指標是各個國家參與國際組織的數量，研究者假定政府參與的國際組織數量越多，那麼其伴隨的學習機會也就越多。馬亮(2013b)採用指標是中國國際友好城市聯合會統計的與外國城市建立友好城市的數量，然而區縣級政府很少有機會能夠與外國城市建立友好親密的城市關係，故而這些指標設計均不符合中國基層政府的實際運作狀況。

府際學習的發生可能通過許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正式管道包括政府及其官員之間的專業協會、研討會和討論組等，它們通過專業出版物、召開現場辦公會、組織考察學習等方式來促進政府間創新的擴散。非正式管道包括政府官員之間的私人關係網絡，特別是同僚網路，為資訊的傳播和溝通提供了管道。」(馬亮，2012b)。根據研究者觀察發現，中國基層政府之間的學習更多體現在政府之間的交流及本級政府舉辦的培訓活動與會議當中。鑒於社交媒體的濫觴與發展集中於最近五年，故研究者在綜合前期理論假設的指向性和經驗資料的可獲得性之後，採取兩個維度數值的匯總(一，政府之間開展的與政務新媒體相關的交流活動的數量；二，本級政府開展的政務新媒體培訓和研討會數量)作為衡量政府學習資源多少的最終指標。為了提高數據指標的有效性，本研究最終將基層區縣級政府網站的學習記錄(如會議和交流記錄)以及研究者對基層區縣級政府政務微信負責人直接訪問所獲得的數據資料進行匯總並加權平均。

### 4. 政府資源與能力：電子政務發展水準

研究者無法獲取到基層政府電子政務發展水準的基礎資料，故而只能量體裁衣，充分利用現有的權威資料。本研究能夠獲取的資料是中國軟體評測中心開發的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報告，該報告提供了進入中國區縣級政府網站績效評估排名前100名的電子政務發展水準的基礎數據，卻沒有提供未進入排名的區縣級政府電子政務發展水準的數據資料。故此，本研究設置了一個虛擬變數：1代表電子政務發展水準高——進入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排名的前100名；0代表電子政務發展水準低——未進入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排名的前100名。儘管這種二分選取比較簡單，但這是研究者目前能夠獲取到的最全面有效的數據。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 5. 政府資源與能力：財政資源健康狀況

儘管直接衡量政府的資源狀況比較困難，但是財政資源依然是政府組織資源的主要表徵。一般來說，政府財政資源採用轄區內人均預算財政收入進行衡量，但也有學者認為應採用政府財政健康狀況來進行衡量。「財政收入只是衡量了政府可以利用的資源，但並未將政府必須支出的專案考慮在內，因而無法正確估計政府可以用於創新專案的財政資源。學者們建議採用財政收支之差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作為衡量政府整體財政健康狀況的指標」(楊宇謙、吳建南、馬亮，2011)。參照既有研究，本文採用的衡量政府財政健康狀況的指標仍是政府的財政收支之差佔其財政支出的比重。

#### 6. 公眾壓力：移動電話用戶總數

鑒於在政府統計年鑒上僅能查詢到廣東省地市級政府年末移動電話用戶總數的資料，故而本研究採用地市級政府的年末移動電話用戶總數除以該地市區縣級政府的個數，作為衡量地市級轄下區縣級政府移動電話用戶總數的代理指標。這只是一個粗略估計，但必須承認這是目前研究者可以獲得的最為接近的資料。

#### 7. 公眾壓力：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

本文採用檢索中國慧科新聞資料庫的方法，檢閱了廣東省報紙媒體所有公開的新聞報導，分別以「群體性事件」、「勞資糾紛事件」、「徵地拆遷糾紛事件」、「環保糾紛事件」、「垃圾焚燒事件」、「山林土地糾紛事件」等關鍵詞疊加的方式進行檢索。鑒於群體性抗爭事件對於發生區域影響的累積效果，研究者選取了相對較長的一段時期(十年)來進行考察。本研究遴選了慧科新聞資料庫報紙媒體對廣東省區縣級政府群體性抗爭事件報導的數量作為衡量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的指標。基於一些報紙媒體的自我審查和脫敏報導，本文在研究中配合使用了百度網路搜索引擎，檢閱搜索到一部分報紙媒體尚沒報導但在一些網站有過報導的群體性抗爭事件，以此來補充、完善和修正這項指標。

### III. 控制變數

#### 1. 控制變數：人口規模

組織規模作為反映組織資源狀況的重要指標，其與組織的創新傾向密切相關。通常組織規模越大，組織創新的資源和能力也就越強。組織規模越大，組織創新條件越優越，創新績效就越高。由此可見，較大的組織規模會對政務微信的創新和擴散產生積極作用，相對於規模較小的轄區來說，規模較大的轄區具有「規模優勢」和「規模經濟」的效應，更傾向於投資和發展政務微信。一項針對美國城市的研究表明，人口規模是影響政府網站擴散的最關鍵因素 (Franzel, 2008)。轄區的人口規模可能影響到政務微信的創新擴散，為此，本研究控制了政府轄區的人口規模，並採用轄區內年末總人口數作為衡量的控制指標。

#### 2. 控制變數：經濟發展水準

通常來說，經濟發展鼓勵公民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務需求 (Berry & David, 1987)，這就是為什麼經濟上越發達、工業化、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政府越傾向於創新 (Walker & Jack, 1969)。「儘管政府創新的關鍵取決於創新者的意願和能力，但創新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如經濟發展水準、資源稟賦、財政狀況、獲得資金的管道等」(楊雪冬, 2008)。相關研究顯示，中國的南方省份經濟比較發達、資訊化水準相對較高，政務公開的意識比較濃厚，因此政務微博的實踐也較為積極 (張志安、賈佳, 2011)。有鑒於此，本研究在模型中對經濟發展水準進行了控制，按照慣例，經濟發展水準通常採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GDP) 來進行衡量，本文對其進行了對數化處理，使之值更小且更方便於操作和解釋。

## 研究發現

本文對數據採用 stata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和處理，鑒於因變數的取值均為正整數 (range = 1~40)，符合統計學意義上的泊松分佈狀態，故而對數據的處理採用泊松迴歸分析 (Poisson regression)，泊松迴歸是專門分析因變數為計數變數的迴歸模型 (Scott & Jeremy, 2001 : 22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260)。本文採用包括控制變數在內的單個自變量逐步進入迴歸方程的方式進行資料的統計，自變量則遵循著從外部因素到內部因素的邏輯順序依次進入。本研究的數據操作流程為：研究者將因變數(平均數 = 9.92，標準差 = 8.63)、控制變數人口規模(平均數 = 76.12，標準差 = 53.37)、經濟發展水準(平均數 = 471.51，標準差 = 659.87)以及自變量上級政府壓力(平均數 = 39.73，標準差 = 21.80)、府際競爭(平均數 = 9.78，標準差 = 7.77)、府際學習(平均數 = 2.09，標準差 = 1.39)、電子政務發展水準(平均數 = .11，標準差 = .32)、財政資源健康狀況(平均數 = -1.09，標準差 = 6.59)、移動電話用戶總數(平均數 = 111.69，標準差 = 110.14)、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平均數 = .90，標準差 = 1.28)等10項指標的數值依次納入到迴歸模型中進行統計檢驗分析，最終得到了9個嵌套的泊松迴歸模型，模型的擬合度檢測值為 Pseudo  $R^2 = 0.58$ 。本次研究統計分析和數值運算的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二 自變項對因變數的泊松迴歸分析表

引數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人口規模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經濟發展水準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上級政府壓力			.03*** (-.00)	.01*** (-.00)	.01*** (-.00)	.01*** (-.00)	.01*** (-.00)	.01*** (-.00)	.01*** (-.00)
府際競爭				.06***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府際學習					.29*** (-.03)	.21*** (-.03)	.22*** (-.03)	.21*** (-.03)	.22*** (-.03)
電子政務發展水準						-.08 (-.09)	-.09 (-.09)	-.15 (-.10)	-.19 (-.11)
財政資源健康狀況							-.01 (-.00)	-.01 (-.00)	-.01 (-.00)
移動電話用戶總數								.00 (-.00)	.00 (-.00)
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									.08*** (-.02)
Constant	1.85*** (-.06)	1.81*** (-.06)	1.16*** (-.08)	1.21*** (-.09)	1.08*** (-.09)	1.07*** (-.09)	1.07*** (-.09)	1.08*** (-.09)	1.08*** (-.09)
N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121
Poisson									
Likelihood	-482.71	-409.65	-353.76	-305.85	-281.91	-281.48	-280.82	-280.35	-243.58
Pseudo $R^2$	.15	.30	.38	.46	.50	.50	.52	.52	.58

註：因變數為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表內括弧外數字為標準化迴歸係數，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代表  $p < .05$ ；\*\*代表  $p < .01$ ；\*\*\*代表  $p < .001$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迴歸模型 1 結果顯示，轄區人口規模與基層區縣級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顯著正相關 ( $\beta = .01, p < .001$ )；迴歸模型 2 結果顯示，經濟發展水準與基層區縣級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顯著正相關 ( $\beta = .00, p < .001$ )。可見，控制變數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水準均通過了較強的統計顯著性檢驗。

在控制了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水準之後：迴歸模型 3 結果顯示，上級政府壓力與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顯著正相關 ( $\beta = .03, p < .001$ )。這說明當地市級政府開通政務微信的數量較多時，其所轄區縣級政府開通政務微信的數量也會相應增加，H1 即上級政府壓力假設獲得了實證支持；迴歸模型 4 結果顯示，府際競爭與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顯著正相關 ( $\beta = .06, p < .001$ )。當鄰近政府的政務微信開通數量較多時，就會刺激到本級政府較多地採納開通政務微信。因此，實證資料也支持了 H2 (府際競爭假設)；迴歸模型 5 結果顯示，府際學習與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顯著正相關 ( $\beta = .29, p < .001$ )。這說明如果基層政府學習資源越多，那麼其開通政務微信的數量也就會越多，H3 即府際學習假設獲得了實證支持；迴歸模型 9 結果顯示，公眾壓力指標中的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與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顯著正相關 ( $\beta = .08, p < .001$ )。說明基層政府轄區的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越多時，其政務微信採納開通的數量也就會越多，H5b (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假設) 獲得了實證資料的檢驗支持。

迴歸模型 6、迴歸模型 7、迴歸模型 8 結果顯示，政府財政資源健康狀況、電子政務發展水準以及移動電話用戶總數與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開通數量均沒有構成顯著相關關係，H4a (財政資源健康狀況假設)，H4b (電子政務發展水準假設) 以及 H5a (移動電話用戶總數假設) 均未獲得實證資料的檢驗和支持。

## 結論與討論

本文採用了廣東省區縣級政府的實證資料，經驗性地呈現了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在轉型中國語境下，影響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主導因素來自於上級政府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壓力、府際競爭、府際學習和公眾壓力，政府的資源與能力對基層政府政務微信的創新擴散並不構成顯著影響。研究進一步揭示：轉型中國的資訊技術並非一種抽象的、與價值無涉的工具，其在政府的創新擴散根植於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土壤。

研究的若干發現需要進一步展開討論：首先，本文最為重要的探索是，基於轉型中國的社會情境特質，增加了一個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的假設，並且獲得了實證證據的支持。當前的群體性抗爭事件是對轉型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和政治生態調整的必然回應，裴宜理(2013)認為，目前中國大部分的社會抗爭應該是日常政治，是老百姓表達意願的一種方式，是有利於政治穩定的。誠然，政府若能致力於搭建資訊技術平台，促成政民之間的良性溝通與互動，可在一定程度上修復國家和社會的二元關係，彌補剛性裂痕，增加政治彈性。研究結論說明制度誘因下以官員晉升為導向的內部驅動依然是推動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原生動力，「維穩」邏輯仍然是主宰基層政治場域的根本邏輯。

第二，任何資訊技術的創新擴散都不應被看作是不證自明的，它都會被現存的政治制度實踐和社會結構情境的稜鏡折射出來。創新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而是一套組成元素和關係，創新擴散受到政治結構和組織制度的束約。因此，政府對資訊技術的採納和運用，不應視為簡單的「創新擴散」與「技術採納」的單一線性過程，而是轉型中國政治、技術和社會的交互產物。「技術是被植入預先確定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中的，在技術的動態趨勢和保持現狀的慣性作用之間存在很大的張力」(胡泳，2008：23)。在轉型社會語境下，政府的決策過程必然凸顯出相當程度的績效訴求和發展主義傾向。故此，上級政府壓力、府際競爭、府際學習等壓力指標依然構成了影響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重要因素。

第三，本文側面印證了創新擴散理論中社會制度對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的影響。由於依託的基礎設施和技術平台不同，不同類型的資訊技術在政府內部的創新擴散影響因素有所差異。比如政府網站的創新擴散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技術以及人力，故而高度受制於政府的資源與能力結構。而微信是一種輕便型的資訊技術，其所依賴的技

##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術平台門檻低。當下中國基層政府開通政務微信運維成本低廉，一般來說也不需要政府部門召開特別的常務會議討論，主管宣傳的領導甚至辦公室主任都可以拍板決定是否採納開通，因此本級政府的財政資源健康狀況對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並不顯著。此外，政務微信依託的移動互聯網路與電子政務依託的技術設施關聯也並不緊密，二者操作的物理平台（移動/固定）不同，故本級政府的電子政務發展水準對政務微信的創新擴散影響也不顯著。

第四，本研究進一步推進了創新擴散研究範式的組織視角，拓寬了創新擴散研究領域的新議題。儘管政務微信的技術平台依附於移動互聯網路，但是公眾壓力指標中的移動電話用戶總數假設並未通過實證檢驗。此結論可以證實資源約束下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的外部驅動並沒有在資訊技術的創新擴散過程中發揮實質作用，「以人為本」、「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等治國方略在轉型中國基層政府的實踐過程中仍顯浮光掠影，落實不夠。這也佐證了學者的某些論斷：當下政府利用新媒體所提供的服務和資訊公開是有限的，其本質是為了提高自身合法性而創建的「象徵性的環境」(symbolic environment) (James, 2000)。

概言之，本文除了運用調查資料實證檢驗了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的經驗貢獻以外，理論上的重要意義在於：第一，首次系統地在政府資訊技術創新擴散的研究模型中增加了群體性抗爭事件數量的研究假設，並經驗性地加以驗證；第二，本文超越單一的「政策擴散」與「創新擴散」的線性思路，立足於轉型中國的情境特質，採用結構和關係維度的綜合考察視角，為未來研究建立起較為紮實的理論基礎。

在得出一系列研究發現的同時，本文也存在若干局限需要指出，以便在研究結果推論和未來研究中加以注意：

首先，鑒於政務微信的興起與發展時間較短且還在繼續變化當中，故對政務微信的創新擴散情況進行縱貫式地解剖和研究將是比較困難的，由於資料獲取的難易程度受限，本項研究最終選取的只是截面資料，此種資料取徑必將捨棄和遮蔽掉一部分過程研究的豐富性和延展性，期望未來研究能夠採用追蹤資料或面板資料對本文的研究假設進行更加穩健性地檢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其次，本文探討的是單變數之間一一對應的因果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本項研究的豐富性和發展性。作為經驗的量化研究，如何在理論模型中假設相對複雜的多變數關係，並對多元變數之間開展一些共變關係的梳理和探討，依然將是未來研究繼續努力和探索的方向。此外，對於一些變數的獲取，本研究是通過手動搜索方式來完成的。在搜索過程中，本研究嚴格採用了關鍵詞組合搜索形式，同時配合使用了電話訪問形式，最終通過數值的兩兩比對，確保變數數值的有效性和準確性。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此種資料獲取方式仍然可能導致一定程度上的信度缺失。

最後，由於受到政府資訊公開化程度的限制，本文難以獲取到中國所有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基礎資料，故而只是選取了資料開放程度較高的廣東省區縣級政府作為本項研究的實證考察對象。一方面，由於觀測數值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發現是探索性和先行性的，將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進一步進行檢驗。另一方面，由於廣東省在中國版圖上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政治社會條件，本項研究結論的適用範圍僅謹慎地推論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達省份，另不做出過度的推論。

## 註釋

- 1 基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宣傳部新聞科科長FX的訪談資料(2015年9月10日)。
- 2 基於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行政服務中心政務微信運維人員XL的訪談資料(2015年9月25日)。
- 3 基於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網宣科副科長WH的訪談資料(2015年7月17日)。
- 4 基於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宣傳科科長JGY的訪談資料(2015年7月20日)。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于建嶸(2010)。《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
- Yu Jianrong (2010). *Kangzhengxing zhengzhi: Zhongguo zhengzhi shehuixue jiben wenti*.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王健、鮑靜、劉小康、王鈿利(2004)。〈《複合行政》的提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衝突的新思路〉。《中國行政管理》，第3期，頁44-48。
- Wang Jian, Bao Jing, Liu Xiaokang, Wang Dianli (2004). *Fuhe xingzheng de tichu — jie jue dang dai zhong guo qu yu jing ji yi ti hua yu xing zheng qu hua chong tu de xin silu. Zhong guo xing zheng guan li*, 3, 44-48.
- 李金銓(2014)。〈在地經驗，全球視野：國際傳播研究的文化性〉。《開放時代》，第2期，頁133-150。
- Li Jinquan (2014). *Zai di jing yan, quan qiu shi ye: Guo ji chuan bo yan jiu de wen hua xing. Kai fang shi dai*, 2, 133-150.
- 李侃如(2010)。《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Li Kanru (2010). *Zhili zhong guo—cong geming dao gaige*.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banshe.
- 周裕瓊、楊雲康(2017)。〈中國社會抗爭的媒介策略：基於環保與徵地事件的綜合比較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0期，頁169-201。
- Zhong Yuqiong, Yang Yunkang (2017). *Zhong guo she hui kang zhen de mei jie celve: Jiyu huan bao yu zheng di shi jian de zong he bi jiao fen xi. Chuan bo yu she hui xue kan*, 40, 169-201.
- 祝建華、何舟(2002)。〈互聯網在中國的擴散現狀與前景——2000年京、穗、港比較研究〉。《新聞大學》，夏季號，頁21-31。
- Zhu Jianhua, He Zhou (2002). *Hu lian wang zai zhong guo de kuo san xian zhuang yu qian jing—2000 nian jing sui gang bi jiao yan jiu. Xin wen daxue, xia*, 21-31.
- 烏爾里希·貝克(2003)。《風險社會》。北京：譯林出版社。
- Wuerlix Beike (2003). *Feng xian she hui*. Beijing: Yilin chubanshe.
- 胡泳(2008)。《眾聲喧嘩：網路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Hu Yong (2008). *Zhong sheng xuan hua: Wang lu shi dai de geren biao da yu gong gong taolun*.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段京肅、王錫苓、李惠民(2007)。〈對落後地區農村互聯網發展的制約因素的探討——以西部農村的一些現象為例〉。《新聞學論集》，第19期，頁210–223。

Duan Jingsu, Wang Xiling, Li Huimin (2007). Dui luohou diqu nongcun hulianwang fazhan de zhiyue yinsu de tantao—yi xibu nongcun de yixie xianxiang weili. *Xinwenxue lunji*, 19, 210–223.

郝曉鳴、趙靳秋(2007)。〈從農村互聯網的推廣看創新擴散理論的適用性〉。《現代傳播》，第6期，頁102–104。

Hao Xiaoming, Zhao Jinqiu (2007). Cong nongcun hulianwang de tuiguang kan chuangxin kuosan lilun de shiyongxing. *Xiandai chuanbo*, 6, 102–104.

馬亮(2011)。〈府際關係與政府創新擴散：一個文獻綜述〉。《甘肅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頁33–41。

Ma Liang (2011). Fuji guanxi yu zhengfu chuangxin kuosan: Yige wenxian zongshu. *Gansu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6, 33–41.

馬亮(2012a)。〈政府創新擴散視角下的電子政務發展——基於中國省級政府的實證研究〉。《圖書情報工作》，第4期，頁117–124。

Ma Liang (2012a). Zhengfu chuangxin kuosan shijiao xia de dianzi zhengwu fazhan—Jiyu zhongguo shengji zhengfu de shizheng yanjiu. *Tushu qingbao gongzuo*, 4, 117–124.

馬亮(2012b)《政府資訊技術創新的擴散機理研究》。西安交通大學博士論文，頁40–41。

Ma Liang (2012b). Zhengfu zixun jishu chuangxin de kuosan jili yanjiu. Xi'an jiaotong daxue boshi lunwen, 40–41.

馬亮(2013a)。〈電子政務發展的影響因素：中國地級市的實證研究〉。《電子政務》，第9期，頁50–63。

Ma Liang (2013a). Dianzi zhengwu fazhan de yingxiang yinsu: Zhongguo dijishi de shizheng yanjiu. *Dianzi zhengwu*, 9, 50–63.

馬亮(2013b)。〈政務微博的擴散：中國地級市的實證研究〉。《復旦公共行政評論》，第2期，頁169–191。

Ma Liang (2013b). Zhengwu weibo de kuosan: Zhongguo dijishi de shizheng yanjiu. *Fudan gonggong xingzheng pinglun*, 2, 169–191.

孫立平、晉軍、何江穗、畢向陽(1999)。《動員與參與——第三部門募捐機制個案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Sun Liping, Jin Jun, He Jiangsui, Shan Xiangyang (1999). *Dongyuan yu canyu—disan bumen mujuan jizhi ge'an yanjiu*. Hangzhou: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 孫立平(2003)。《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Sun Liping (2003). *Duanlie: 20 shiji 90 niandai yilai de zhongguo shehu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埃弗雷特·M·羅傑斯(2002)。《創新的擴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Aifuleite M. Luojiessi (2002). *Chuanxin de kuosan*. Beijing: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 榮敬本(2009)。〈變零和博弈為雙贏機制——如何改變壓力型體制〉。《人民論壇》，第2期，頁28–29。
- Rong Jingben (2009). *Bian linghe boyi wei shuanying jizhi—ruhe gaibian yalixing tizhi*. *Renmin luntan*, 2, 28–29.
- 常昌富(2000)。《大眾傳播學：影響研究範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Chang Changfu (2000). *Dazhong chuanboxue: Yingxiang yanjiu fanshi*.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張志安、賈佳(2011)。〈中國政務微博研究報告〉。《新聞記者》，第6期，頁34–39。
- Zhang Zhian, Jia Jia (2011). *Zhongguo zhengwu weibo yanjiu baogao*. *Xinwen jizhe*, 6, 34–39.
- 張明新、韋路(2006)。〈移動電話在我國農村地區的擴散與使用〉。《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期，頁10–23。
- Zhang Mingxin, Wei Lu (2006). *Yidong dianhua zai woguo nongcun diqu de kuosan yu shiyong*.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 10–23.
- 楊宇謙、吳建南、馬亮(2011)。〈服務型政府與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創新——基於德爾菲調查法的發現〉。《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第5期，頁141–148。
- Yang Yuqian, Wu Jiannan, Ma Liang (2011). *Fuwuxing zhengfu yu zhengfu jixiao pinggu tixi chuanguan—jiyu deerfei diaochafa de faxian*. *Jingji shehui tizhi bijiao*, 5, 141–148.
- 楊雪冬(2008)。〈簡論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研究的十個問題〉。《公共管理學報》，第5期，頁16–26。
- Yang Xuedong (2008). *Jianlun zhongguo difang zhengfu chuanguan yanjiu de shige wenti*. *Gonggong guanli xuebao*, 5, 16–26.
- 楊國斌(2013)。《連線力：中國線民在行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Yang Guobing (2013). *Lianxianli: Zhongguo wangmin zai xingdong*.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劉能(2008)。〈中國群體性集體行動的幾點理論思考——建立在經驗案例之上的觀察〉。《開放時代》，第3期，頁110–12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 Liu Neng (2008). Zhongguo quntixing jiti xingdong de jidian lilun sikao—jianli zai jingyan anli zhishang de guancha. *Kaifang shidai*, 3, 110–123.
- 裴宜理 (2013)。〈崛起的意義——把人的尊嚴帶給底層社會〉。《社會科學報》，第1359期，頁3。
- Pei Yili (2013). Jueqi de yiyi—ba ren de zunyan daigei diceng shehui. *Shehui kexuebao*, 1359, 3.
- 鐘智錦、曾繁旭 (2014)。〈十年來網路事件的趨勢研究：誘因、表現與結局〉。《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期，頁53–65。
- Zhong Zhijing, Zeng Fanxu (2014). Shinian lai wangluo shijian de qushi yanjiu: Youyin biao xian yu jieju.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4, 53–65.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hn, M. J. (2011). Adoption of e-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in U.S. Municipalities: The role of political environment,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application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1(4), 428–452.
- Balla, S. J. I. (2001). Interstat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innovatio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29(3), 221–245.
- Berry, W. D., & David, L. (1987). *Understanding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ostwar era*. New York, NY: Praeger Publishers.
- Berry, F. S., & Berry, W. D. (1990). State lottery adoptions 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2), 395–415.
- Berry, F. S., & Berry, W. D. (1999).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models in policy research. In P. A. Sabatier (ed.),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pp. 17–25). Boulder, CO: Westview.
- Borins, S. (2008). *Innovations in government: Research, recognition, and replic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Bulmer, S., Dolowitz, D., Humphreys, P., & Padgett, S. (2007). *Policy transfer in European Union governance: Regulating the uti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Chou, B. K. P. (2008). Does good governance matter?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1(1), 54–75.
- Daley, D. M., & Garand, J. C. (2005). Horizontal diffusion, vertical diffusion, and internal pressure in state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1989–1998.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3 (5), 615–644.
- Eyerman, R., & Andrew, J. (1991). *Social movements: A cognitive approach*.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Press.
- Foster, K.W. (2006). Improving municipal governance in China: Yantai's pathbreaking experiment in administrative reform. *Modern China*, 37(2), 221–250.

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

- Franzel, J. M. (2008). Urban government innovation: Identifying current innovations and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ir adoption.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5(3), 253–277.
- Graham, E. R., Charles, R. S., & Craig, V. (2013).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3), 673–701.
- Gray, V. (1974). Expenditures and innovation as dimensions of progressivism: A note on the America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4), 693–699.
- Heilmann, S., & Perry, E. J. (2011).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Ibarra, H. (1993). Network centrality, power, and innovation involvement: Determinants of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ol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 (3), 471–501.
- James, D. W. (2000).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review).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7(2), 183–205.
- Jun, K. N., & Weare, C. (2011). Institutional motivations in the adoption of innovations: The case of e-govern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1 (3), 495–519.
- Kung, J. K. S., & Chen, S. (2011). The 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1), 27–45.
- Lee, C. P., Chang, K., & Berry, F. S. (2011). Tes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e-government and e-democracy: A global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1(3), 444–454.
- Li, H., & Zhou, L. A.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 1743–1762.
- Montinola, G., Qian, Y., & Weingast, B. R. (1996).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1), 50–81.
- Osborne, D., & Gaebler, T. (1992).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New York: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Rose, A. S. (1980). Risk taking and reelection: Does federalism promo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9, 593–616.
- Scott, J. L. & Jeremy, F. (2001).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Texas: Stata Press.
- Strumpf, K. S. (2002). Does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policy innov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4(2), 207–241.
- Tolbert, C. J., Mossberger, K., & McNeal, R. S. (2008). Institutions policy innovation and e-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sta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8(3), 594–663.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6期(2018)

- Nicholson-Crotty, S. (2008). The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of privatization: Contracting out for corrections 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2(1), 41–57.
- Walker, J. L. (1969).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3), 880–899.
- West, D. M. (2005). *Digital government: Technology and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u, Y., & Bauer, J. M. (2010). E-government in China: Deployment and driving force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 portal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3), 290–310.
- Yang, D. (2006).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olitical discontents in China: Authoritarianism, unequal growth, and the dilemma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9, 143–164.

## 本文引用格式

曾麗紅 (2018)。〈轉型中國基層政府政務微信創新擴散的影響因素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6期，頁89–120。